

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发生

王晓初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鲁迅研究虽然有一个逐渐从后期鲁迅向前期鲁迅、早期鲁迅推进的过程,但对给予了鲁迅思想与文学发生深刻影响的“童年经验”仍然重视不够。这种童年经验不仅成为终身守护鲁迅心灵的精神家园和他文学发生的原型与灵感,而且在沟通与越地远古先民的精神传承中,奠定了他热爱自由、反抗压迫的天性取向;同时在与自然、生命、农民的亲和中确立了他和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血脉相通的左翼倾向。

关键词:童年经验;鲁迅;思想;文学;发生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1-0136-05

一、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与童年经验

1933年瞿秋白发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第一次对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作出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鲁迅在中国人民与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典范性意义——“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青年叛徒的领袖”^{[1]271},从而纠正了当时“左”或右倾对鲁迅的模糊认识。不过,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出发,也把鲁迅的思想简单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276}的历程,从而奠定了划分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基本模式,并且认为后期政治的阶级的鲁迅高于前期启蒙的文化的鲁迅。这一模式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日益高涨而偏激到否定前期鲁迅的程度。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展开,李泽厚1979年发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虽仍然坚持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划分,但明确说:“从早年到晚岁,鲁迅虽然经历了思想的重大变迁,但始终抓住启蒙不放。启封建之蒙,向它作持久的韧性的战斗。特别是在晚年,鲁迅对于各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旧事物,或附在新事物上的旧幽灵,总是剥其画皮,示其本相,以免它们贻害于人民。鲁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启蒙思想家。”^[2]从而对鲁迅的启蒙思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随后,王得后1981年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中进一步提出鲁迅的启蒙(“立人”)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始终,遍及鲁迅著作的各个方面,是鲁迅思想的核心”^[3],从而凸现了鲁迅的思想文化价值,并由启蒙的鲁迅引发了对于启蒙(“立人”)鲁迅得以生成的鲁迅早年思想的关注。王富仁提出“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应从《文化偏至论》的发表起”^[4]。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则认为鲁迅1906年从仙台来到东京从事《新生》文艺运动所准备的几篇评论,奠定了后来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基本原型与框架,因而他把这一时期的鲁迅称为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原型的“原鲁迅”^[5]。钱理群后来在他的《与鲁迅相遇》中也把这一时期鲁迅“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定为“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6]。不过,为什么鲁迅得以在1907年前后的日本东京形成“这一个”的思想呢?伊藤虎丸除了强调鲁迅与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相遇之外,对于鲁迅所传承的中华民族追求民主与个性解放的异端文化思潮的血脉有所疏忽^[7],对于鲁迅早年生活之于鲁迅思想艺术的影响虽然也卓有创见,但对于童年经验(特别是由大禹和

* 收稿日期:2010-04-27

作者简介:王晓初(1956-),男,重庆奉节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09FZW005),项目负责人:王晓初。

勾践作为原型的越文化精神)对鲁迅思想与艺术形成的影响,仍然重视不够。

现代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他儿时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关联。弗洛伊德通过对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的细致分析,充分证明了“只有具有列奥纳多童年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为他的作品招来如此令人伤感的命运,才能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达到如此惊人的成就,似乎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秘密都隐藏在童年的秃鹫幻想之中”^{[8]102};“一个人思考他在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残留的记忆——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理解——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无法估价的证据”^{[8]59}。同样,鲁迅赴南京读书前在故乡绍兴度过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孕育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胚胎,甚至有些因素成为贯穿鲁迅一生始终的精神原型。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不但不少作品都投射或映现了故乡越地的底色或背景,而且如前所述,他还不断地返回故乡,去寻觅精神慰藉与精神家园。如同他自己所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9]虽然这些“童年回忆并不真是记忆的痕迹,却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但是“这些被遗忘的童年心理活动并不轻易消逝,必将烙痕于个人的发展史上,永远影响他的未来”^[10]。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他(鲁迅)谈到绍兴,每次都使我发生一个相同的感受,就是他的故乡绍兴,似乎常常在引起他的一种很可回味的回忆。而这种回忆似乎不是由于别的,就只由于在那里有过他的童年的生活,有过他和农民以及下层社会的人民的接近,他于是有着一种深刻的留恋和爱。”“正是这种回忆带给他一种力量,带给他文章上一种生气和风格上一种美,因为这种回忆大都是关于他以前所接触的农村与下层社会的人民的印象的。”^[11]夏志清也说:“他(鲁迅)的故乡显然是他灵感的主要源泉”,虽然“鲁迅对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深感悲愤;新思想无法改变他们,鲁迅因之摈弃了他的故乡,在象征的意义上也摈弃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然而,正与乔哀思的情况一样,故乡同故乡的人物仍然是鲁迅作品的实质”^[12]。冯雪峰说:“当他写好《女吊》后,大约是(1936年)九月二十或二十一的晚间,我到他那里去他从抽屉里拿出原稿来:‘我写好了一篇就是所说的绍兴的‘女吊’,似乎比前两篇强一点了。’”^[13]日本友人鹿地亘也回忆说鲁迅去世前两天的10月17日,他们夫妇见到鲁迅时,鲁迅谈话间提到他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神情颇为得意,“以有特征的鼻子上聚起皱纹的笑法笑着而这样说”^[14]。鲁迅临终前,对以充满原始野性与抗争精神的“女吊”为代表的故乡越地文化精神的回归与眷顾,正表明从童年时代就烙印在他心中的以社戏、目连戏为代表的越地民间文化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及对由这种文化形式所凸显出来的越地源远流长的“报仇雪耻”精神的坚守与张扬。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中,像鲁迅这样与其所属的区域文化联系如此深刻紧密,怕再无出其右者”^[15]。越文化构成了鲁迅思想与艺术发生的最初的原点,构成了鲁迅思想与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二、越地的神话传说与鲁迅的天性取向

鲁迅对自己童年最早的回忆,大约要数《我的第一个师父》中在他不到一岁拜长庆寺龙师父为师的事。虽然当时拜师的情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不过这最初的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却是“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16]。特别是他替戏子敲锣,与观众对骂,躲避甘蔗梢头的攻击而结识了师母并养育了一群小和尚的故事,更是活脱脱地呈现了一个风流潇洒、放任自由的独特和尚的形象,激活了小鲁迅追求自由、热爱生活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可以称为越人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原型。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

‘原型’”，这种集体无意识原型“容纳着从我们祖先——他们以他们的存在为物种的演化做出了贡献——的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财富”，虽然“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传递给我们”，但“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17]。

或许正是这种天性(原型)，小鲁迅对弥漫于越地的民间神话、传说中那些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形象充满同情，对那些压制人的自由与人性的黑暗势力充满憎恶。在一个个夏夜，当他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由西湖的雷峰塔而给他讲起白蛇娘娘带着青蛇丫环嫁给曾经救过她们的许仙后，被法海和尚生生拆散，并把前来寻夫的白蛇娘娘镇压在雷峰塔下，他当时“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长大后，“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这正是“吴、越的山间海滨”共同的“民意”^[18]。后来在大舅父那儿看到一部弹词《白蛇传》，竟用指甲将法海绣像的眼睛掐得稀烂^[19]，本色地表达出小鲁迅朴素的爱憎。

这种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精神，使小鲁迅十分神往远古先民神话中那些狂放不拘、神采飞扬的具有强悍生命意志与创造精神的神话形象。他的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告诉他，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之后，他就日思夜想，念念不忘。保姆长妈妈费心买来《山海经》，他“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鲜明地展现了先民最自由、最神奇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神话作为一种表达原型的方式，并“不是被原始人类用来赏心悦目、陶冶性情的，它包含着更深刻的一种精神。其中寄托着原始人类对宇宙奥秘的理解和对自己‘命运’的固执追求。……原始的神话比文明的艺术，更直接地表达了人性中接近‘底层’或‘本质’的东西”^[20]。那能歌善舞的神鸟帝江，特别是那虽被断头还要执干戚而舞与天帝抗争的刑天，十分耀眼地呈现了远古先民顽强抗争的精神和自由创造的生命意志，深深地融贯到鲁迅的人格精神与文学创作之中。周作人回忆说：“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21]绍兴是传说中“禹禅会稽”、“禹疏了溪”、“禹会会稽”、“禹娶会稽”、“禹葬会稽”的所在，上演过卧薪尝胆的吴越春秋英雄传奇，遍布大禹、勾践遗迹，如大禹陵庙、禹祠、窆石、越王陵、越王峥、越王台、浣纱溪、投醪河等等。这些闪耀着越地先民英雄业绩的遗迹，熏陶着鲁迅的成长，引起小鲁迅无限的遐想与神往，每睹“禹勾践之遗迹”，而“穆然有思古之情”^[22]，他不但专门写了《会稽禹庙窆石考》，而且直接赞扬越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23]，表达了他对以大禹、勾践为原型的越地先民创造精神与坚强意志的自觉认同与向往。不过，对另一些违反、压抑甚至扼杀人性的传说故事，小鲁迅却充满了天然的反感。例如，他最先得到的一本《二十四孝图》的图画书，高兴极了，但“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在他“请人讲完了二十四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虽然“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乃至“陆绩怀桔”之类可以勉强做到，但“卧冰求鲤”就有性命之虞了。特别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一个是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而且还要“诈跌”；另一个是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却正在被父亲掘坑活埋。这种“以不情为伦纪”^[24]，真使人感到人生的阴森与恐怖。对《山海经》与《二十四孝图》不同取向的对比，清楚地显示出小鲁迅天真烂漫、渴望自由、爱好驰骋想象的天性，显示出对束缚、扭曲人性的道德的天然厌恶。

三、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和与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与血肉联系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天性使鲁迅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勇于探索。鲁迅二、三岁时，因种痘得到父亲的两件礼物，其中一件是万花筒：“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

望,那可真是倚欹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然后就想来“探检这奇境了”,“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25]。虽然使他遗憾了大半生,但也纯真地表现了他儿时好奇探索的精神。而他家后园由各种植物花卉昆虫组成的百草园,则被他当作被围墙围困起来的台门世家里的自由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26]通过他心灵的感应,这些平淡无奇的虫鸟动物和花卉草木,被他赋予神奇而灵动的生气、韵律与色彩。由此鲁迅也很喜爱他偶然救活的一只小隐鼠,虽然柔弱,却十分可爱,“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放在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27]。

当然,对于“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的台门子弟来说,要知晓那“四角的天空”以外的世界和事情,也是困难的。对于生命、自然、自由充满憧憬与向往的小鲁迅,却渴望冲出这一封闭的台门。因而,海边的小闰土来他家帮忙,给他讲“雪地捕鸟”、“瓜地刺猹”,还有“五色的贝壳”、“有青蛙似的两个脚”的跳跳鱼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他们就成为了知心的朋友。特别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28]的图画,成了鲁迅心灵永恒的记忆。当鲁迅跟随母亲去外祖母的家探亲,外祖母家所在的小小的安桥头村,则构成了小鲁迅的乐土。那村子“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作为远方来客,小鲁迅不但受到优待,而且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诗句了。“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许多小朋友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来伴他游戏。他们打破了森严的宗法秩序,不论行辈,一起玩耍,一起吵闹。掘蚯蚓,钓虾,放牛,又在海滩上寻蛇:用竹杆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苇丛中出来,几十条不断。还结伴独立摇船去更远的赵庄看社戏^[29]。在回村的路上,当大家饿了想摘一点罗汉豆来吃时,阿发毫无私心地选择了自己家的豆,因为他家的豆大得多。另一被摘豆的人家六一公公也没有责怪他们,反而说请客,还送了一些给“我”外婆家里。正是从这些淳朴的民性中,鲁迅感受到“气禀未失之农人”的“白心”^[30],一种“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未尝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所保持的“心思纯白”的天性,也正是这些“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31]。如前所述,这些“白心”正默默地传递着自远古以来越人中那些“气禀未失之农人”的“素心”。也正是从这些淳朴的“白心”中,鲁迅沟通了远古越地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原型,贯通了民族固有精神之血脉。另一方面鲁迅又从这些农民的身上了解到他们的苦难、痛苦和悲哀。他后来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觉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32]“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及学者的生活中”^[33],对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亲近与同情,奠定了他和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血脉相通,始终关怀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为他们的解放呼号、抗争,并最终走向左翼运动的精神原点。诚如瞿秋白所说,“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34]。

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宏大的题目。从1881年出生,到1898年“走异路,逃异地”^[35]到南京求学,鲁迅在故乡越地度过了18个春秋,而越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而又独

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给鲁迅留下的深刻印记是不可低估的。除了本文谈到的“越地的神话传说与鲁迅的天性取向”,“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和与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与血肉联系”等方面外,起码还包括以目连戏、社戏、“大戏”(绍剧)为代表的,还包括具有越地特色的花纸、绣像、木刻等越地民间艺术、语言与风俗,渊源于大禹勾践原型的,以“浙东学术”(“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等)乃至“浙东性”(包括“师爷气”)为代表的越地思想文化传统,都给了鲁迅深刻影响,还有作为“台门子弟”所感受的世态炎凉等,共同形成了鲁迅独特的思维方式、气质个性、文学个性与艺术风格等。可以说,这种童年经验构成了终身守护鲁迅心灵的精神家园和他文学发生的原型与灵感,奠定了他思想与文学中深厚的越文化底蕴,从而也就构成了鲁迅思想及文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限于篇幅,其他的一些方面只能另文探讨了。

参考文献:

- [1] 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G]//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2]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9.
- [3] 王得后. 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G]//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册.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561.
- [4] 王富仁. 从“兴业”到“立人”[J]. 中国社会科学,1987(2):181-200.
- [5] 伊藤虎丸. 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0.
- [6] 钱理群. 与鲁迅相遇[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0.
- [7] 王晓初. “原鲁迅”:在传承与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70-74.
- [8] 弗洛伊德.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M]//弗洛伊德论美文选.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 [9]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6.
- [10] 弗洛伊德.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38-40.
- [11] 冯雪峰. 回忆鲁迅[G]//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10,678.
- [12]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29-30.
- [13] 冯雪峰. 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G]//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6.
- [14] 鹿地亘. 鲁迅和我[G]//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473.
- [15] 陈越. 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J]. 鲁迅研究月刊. 2000(6):20-27.
- [16] 鲁迅. 我的第一个师父[M]//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7.
- [17]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3,42,120.
- [18] 鲁迅. 论雷峰塔的倒掉[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8-180.
- [19] 周作人. 鲁迅的青年时代[G]//关于鲁迅.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402.
- [20] 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82.
- [21] 周作人. 鲁迅的故家[G]//关于鲁迅.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53.
- [22] 鲁迅.《会稽郡故书裸集》序[M]//鲁迅全集:第10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
- [23] 鲁迅.《越铎》出世辞[M]//鲁迅全集:第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
- [24] 鲁迅. 二十四孝图[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2.
- [25] 鲁迅. 我的种痘[M]//鲁迅全集:第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6.
- [26] 鲁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7.
- [27] 鲁迅. 狗·猫·鼠[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4.
- [28] 鲁迅. 故乡[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4,502.
- [29] 鲁迅. 社戏[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0.
- [30] 鲁迅. 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29.
- [31] 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8,140.
- [32] 鲁迅.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第7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1.
- [33] 戈宝权. 史沫特莱回忆鲁迅[G]//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453.
- [34] 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G]//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66.
- [35] 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